

## 一、前言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點之一，該運動在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各層面都有極大的影響，要對此一重大問題作評述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應從小問題上面著手；五四期間的愛國運動是一個可以切入的主題，但整個愛國活動所占的時間、空間、人物畢竟十分龐大，需要再往小處發展，筆者在此時注意到了天津一帶的愛國運動——抵制日貨與提倡國貨運動，特別是宋則久對於愛國布的倡導問題。

「愛國布」具有何種意義而值得討論呢？這必須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的生產背景之上；中國自明代之後棉花的種植日漸擴大，相關的紡織工業也漸漸發達，逐漸與傳統的絲織品角逐中高階的消費市場，在外人勢力入侵之前，棉織品在中國的消費市場裡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鴉片戰爭後中國陸續的開港，外人商品不斷的銷入中國，與中國傳統的各種商品共同爭食中國的消費市場，洋布即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進口貨物；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製棉布也逐漸成為進口洋布一個重要的來源。中國的本土織品一般俗稱土布，其大部份的加工出處來自傳統農村的副業，水準不一的狀況成為必然現象，價格難有下降空間；外國進口的洋布卻是由工廠出產，生產水準一致，價格則因大量生產及生產成本回收而逐年下降，漸漸擊敗了原本以價格低廉而存有競爭力的土布，洋布的勝利對於中國的傳統棉織業造成了莫大的打擊，進一步擴大了列強對於中國經濟壓迫。

面臨此一空前的危機，有志之士開始提倡本土棉織品的改良，藉由改良後的國產棉布與洋布作市場競爭，奪回國內喪失殆盡的棉織品市場，力圖振作中國的民族工業，而此種布類也因為對抗洋布所沾染的政治氣息而贏得了“愛國布”的別稱。

天津是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吞吐港，外國經濟力入侵的代表之一——洋布由此大量進口，碰巧的是，“愛國布”的重要提倡者“宋則久”及其領導的“天津國貨售品所”，五四時期在此地積極的參與提倡國貨運動，日製的棉製品成為抵制的對象；加上天津紡織業非常發達的因素，<sup>1</sup>兩種布類在天津產生激烈的競爭，這也是筆者選擇天津來討論的原因。

---

<sup>1</sup> “據統計，自民國五年至十一年間，全國新建紗廠有四十八家，資本總額七千一百四十六萬一千元，紗錠總數一百餘萬枚，而天津此時期增加的資本占全國增加的資本之百分之三十，增加的紗錠佔全國增加紗錠的百分之三十一。至民國十一年時，成了全國第二大棉紗城市，同時也是華北的棉紡織中心。”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台北：撰者自印，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57。祝淳夫，〈北洋軍閥對天津近代工業的投資〉，《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四輯，頁148。

依現在的眼光來看，廣大的商業市場往往取決於買方，也就是由消費者的好惡決定該貨物進口的數量，但五四時期的情況卻並非如此：消費者的力量尚未能夠決定市場取向，貨物的流通及採購取決於賣方，由大商家來決定主要的市場取向；因此，商人的態度對於愛國布與日製棉布的大戰結果有極大的影響力。筆者認為在探討棉布之爭的問題上，必先就商人的態度來切入問題，本次報告所欲探討的主題便是商人如何看待此類愛國活動，決定商人態度的重要因素為何？

## 二、宋則久與愛國布

### （一）一九二一年前的宋則久

宋則久（1867~1956）又名壽恒，清末生於天津一個錢莊小商人家庭，自小即因父親早逝而生活困苦，七歲入私塾讀書，十五歲被送入義德泰布莊當學徒，隨後在慶祥、隆聚、德生錦及敦慶隆等布行工作，這是他從事商業活動的初級階段。<sup>2</sup>清末一陣工業改革的浪潮中，周學熙“興學校、辦工場”的想法與宋不謀而合，因此宋則久得以獲得部份的經費支援，開始興辦各種職業教育，開辦實習工場，但由於不敵外人商品的競爭，除工藝較簡單者，其它多遭失敗而倒閉。<sup>3</sup>

一九一二年宋則久創辦了直隸國貨維持會，一九一三年獨自接辦了工業售品所（天津國貨售品所前身），自此之後，宋氏便為倡導國貨而努力不懈，一九一五年七月、十月；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月分別在天津及北京舉辦國貨展覽會，至一九三二年前共舉辦了十五次國貨展覽會，國貨提倡已成宋氏及售品所的經常業務。<sup>4</sup>

五四時期宋則久積極參與愛國活動，除擔任“國民大會”的副主席之外，售品所也參與抵制日貨、倡導國貨的愛國運動，並成立了救國十人團，配合學生及其它愛國團體，熱烈響應當時的愛國活動。

宋則久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原因在於：宋氏了解到中國本身經濟的處境，在一九一五年發表的〈兵戰與商戰〉<sup>5</sup>寫道：

<sup>2</sup> 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工商史料叢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五輯，頁34-35。

<sup>3</sup> 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工商史料叢刊》，第五輯，頁39-41。

<sup>4</sup> 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工商史料叢刊》，第五輯，頁41-44。

<sup>5</sup> “該文發表在1915年宋自編的《售品所半月刊》上，後又收入《宋則久論著》中”，由於筆者在台灣並未蒐尋到此書，故轉引自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工商史料叢刊》，第五輯，頁36。

戰是打仗，兵戰是用槍炮打，商戰是用工藝打……兵戰打敗了，賠款用的是利息，因為各種實業尚在。商戰打敗了，賠款用的是基本，因為實業全無，無處生利，越打越窮。兵戰打敗了，是一時的忍耐，將來還是英雄，因為把賠款還完了以後，各種實業所生出來的利甚多，人民依然富足，國本依然鞏固。商戰打敗了是永遠窮困，將來必成奴隸。

由上可知，宋氏認知到兵戰之後商戰的到來，兵戰戰敗不足以動國本，商戰失敗則國本動搖，必定走向窮困之路；反之，商戰成功便能富國，富國之後而能生大力量。在宋氏的眼光裡，國富的根本在於中國的民族工業，民族工業復興之後，中國才有強大的可能；此一信念促使宋氏致力於民族工業的復興，提倡國貨買賣經營的重要性。國貨的種類甚多，但就時間及其影響來說，愛國布的經營可說是一個重點，對於日人來說，由於日人投資中國紡織業（包含日資紡織廠、日人自設紡織廠）者甚多、資金龐大，中國的愛國布又是針對日製棉布作模仿，並視其為主要的敵手；因此，筆者選擇以愛國布來當主題、配合一九一九年的抵抗日貨風潮來進行討論。

## （二）愛國布的特色及經營

林原文子《宋則久與天津國貨提倡運動》<sup>6</sup>一書寫道：

……洋布可以說最為列強經濟侵略的先鋒部隊，經過天津向華北一帶滲透。民國之後，反復開展的抵制洋貨運動中，經常是由“愛國布”充當先鋒。……當時的日本人，把宋則久視為“愛國布”的創始者，對他的提倡國貨運動，括目相看……<sup>7</sup>

在這段文字之中，我們看到了愛國布與宋則久的密切關係，但其起源依據〈愛國商人宋則久〉<sup>8</sup>一文中所述，大約是清光緒三十年（1904）李鴻章奏請大辦織布局之後出現的，當時清政府認識到帝國主義對我經濟親略中的鴉片已漸為洋布所替代，為了抵制這種親略，必須發展國產布，故有大設織造局之議。<sup>9</sup>

愛國布其實是國產棉布的別稱，其有兩項特點：第一，愛國布是由中國人自己織出的布，雖然大部份使用日本紗當原料，但日本紗的原料卻大部份是中國的棉花。第二，愛國布的特點是先染線，後織造，布面較窄，二尺二到二尺三寸，一丈多長，顏色有青、藍、灰等色，平紋，有經緯各42支紗和經42緯20支紗兩種。<sup>10</sup>

<sup>6</sup> 林原文子，《宋則久 天津 國貨提倡運動》（日本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出版，1983年）。

<sup>7</sup> 林原文子，《宋則久 天津 國貨提倡運動》，頁8-9。

<sup>8</sup> 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工商史料叢刊》，第五輯，頁33-72。

<sup>9</sup> 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工商史料叢刊》，第五輯，頁45。

<sup>10</sup> 敬瑞，〈愛國商人宋則久〉，中國民主建國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天津

愛國布主要交由“天津國貨售品所”<sup>11</sup>經營，在許多地區多獲好評，因其主要對手是洋布及日製的棉製品，因此“愛國布”名聲開始聞名大江南北。

### 三、愛國布的成與敗

#### （一）愛國布的提倡成果

愛國布開始大力宣傳於宋則久主持直隸國貨維持會的時代（1912），其後向江南一帶方面發展，一九一二年九月至一九一四年一月間，總共有南京、蘇州、鎮江、徐州、清江浦、揚州六個模範工場設立，各工廠都有一百至兩百人左右的見習職工接受織布、漂白、染色等技術的指導。<sup>12</sup>

上海一帶，往昔是農村副業土布外銷的重要港口，後來各種棉織品包括愛國布都由此地向長江流域及香港、南洋大量輸出；上海本地也有許多織布工廠，許多新式織布工場都把“愛國布”三字放入其工廠名稱之中，例如「匯西愛國布廠」（一九一二年二月創立，織機一百七十台）、「玉記愛國布廠」（織機六十台），兩工廠在上海地區的生產率約占6%左右。<sup>13</sup>

蘇州一帶自清末開始便是愛國布織造的重要場所，民間自一九一二年設立了「震豐織布場」（織機兩百台，資本金十萬元），這是民間開始織造愛國布的開始，主要銷路是蘇州本地，其它則銷往山東、安徽等地。<sup>14</sup>

浙江省杭州一區自古養蠶業發達，是為絹織業的專區，但民國後棉織業開始發達，在表一之中，我們可看出一九一六年絹布及棉布的生產比例，在表二裡，我們可看出該年愛國布的生產量約占全部的7%左右，生產總價比例方面約占14%左右。<sup>15</sup>

---

工商史料叢刊》，第五輯，頁46。

<sup>11</sup> “天津國產售品所（以下簡稱售品所）是一九一三年由宋則久接辦官營的天津工業售品所而成立的，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為止，前後共四十四年，其間改變了三次名稱，分別是：天津國貨售品所、天津百貨售品所、中華百貨售品所，其中以天津國貨售品所的名稱時間最長，共十六年。”馬壽頤、趙孟然、宋廷璋，〈宋則久與天津國貨售品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頁93。

<sup>12</sup> 林原文子，《宋則久 天津 國貨提倡運動》，頁38。

<sup>13</sup> 林原文子，《宋則久 天津 國貨提倡運動》，頁38。

<sup>14</sup> 同上註。

<sup>15</sup> 同上註。

表一 一九一六年浙江省織物產類比例<sup>16</sup>

種 類	織戶數	織工數	生產量(疋)	總 價 (元)
絹 布	6,886	29,716	387,122	7,648,500
棉 布	21,630	45,114	2,257,209	3,843,368

表二 一九一六年浙江省各式棉布生產量及總價<sup>17</sup>

品 名	生產量(疋)	生產量比例	總 價(元)	總價比例
大 布	1,346,892	60%	1,512,127	39%
柳條布	323,489	14%	676,597	18%
愛國布	154,235	7%	540,380	14%
紗 布	430,967	19%	229,749	6%
斜紋布	986	0%	4,086	0.1%
其 他	***	***	880,429	23%
總 計	2,256,569	100%	3,843,368	100%

長江流域愛國布的生產也極為興盛，武漢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間，民間的織布工廠開始激增，武漢三鎮一共有三十所工廠，織機台術約有一千台，若連同官立的六百五十八台織機，一共有一千六百餘台的織機，年產五十四萬疋的生產量。一九一七年據日本技師的報告指出，湖北省該年共輸入棉紗十一萬五千包左右，有40%以上（約五萬包）左右是使用在粗布、愛國布、提花布等的生產之上；由於愛國布受到大眾的歡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武漢的染色及織布工廠設立情況非常興盛。由表三可看出直隸、江蘇、浙江、湖北四地的愛國布生產情況。

<sup>16</sup> 林原文子，《宋則久 天津 國貨提唱運動》，頁39。

<sup>17</sup> 同上註。

表三 直隸、江蘇、浙江、湖北生產數量及總價<sup>18</sup>

年次	直隸		江蘇		浙江		湖北	
	數量 (萬疋)	總價 (萬元)	數量 (萬疋)	總價 (萬元)	數量 (萬疋)	總價 (萬元)	數量 (萬疋)	總價 (萬元)
1912 年	32	100	43	135	17	41	10	15
1913 年	59	106	23	65	31	73	15	16
1914 年	168	351	31	94	15	54	7	27
1915 年	172	433	35	83	14	53	6	20
1916 年	78	242	47	114	24	81	15	52
1917 年	80	382	159	1002	20	87	37	82
1918 年	81	328	250	1623	18	77	38	87
1919 年	94	647	189	1229	17	71	**	**
1920 年	76	380	311	1510	**	**	**	**

清末以來十年間愛國布不斷蓬勃發展，外國棉布的進口量逐漸下降，愛國布及其它國產的棉布類已漸漸取回原本日本製棉布的中國市場，除中國本土織布業者多靠其維生而支持愛國布，學生及其它愛國團體也極力支持，但此一情況到了五四時期卻出現了變化；某些團體開始對愛國布的本質及推廣發生了不同的意見。

## (二) 五四時期對於愛國布的爭議

愛國布雖然倡銷一時，但其根本原料問題卻造成其本身重大的爭議點，《南開日刊》

<sup>18</sup> 林原文子，《宋則久 天津 國貨提唱運動》，頁84。

第三十七號，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織布工人爲抵制日線而罷工〉<sup>19</sup>一文指出：

……因為吾們織布工人，每日用的皆是日本合股洋線。咱們中國人織布，用中國線叫愛國布，刻下這愛國布，皆日本線織的，不能叫他愛國布，叫他亡國布。……抵制日線提倡本國線，是我們的宗旨，請問愛國布是真國貨否？不用本國線何能叫他愛國布呢？……

天津《益世報》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各界聯合會爲南開學校設廠制國貨事致函總商會〉<sup>20</sup>一文指出：

……提倡國貨爲救國根本，然市間所售之國貨純用中國原料者，百無一二。……

另外，表四是日本紗進口的比例數據：

表四 天津日本棉紗進口量及比例（1911~1919）<sup>21</sup>

單位：擔

年 別	日 本	國外 合計	日本進口占國 外進口比例
1911年	133,220	235,480	57%
1912年	179,440	306,877	58%
1913年	238,480	370,661	64%
1914年	292,800	400,703	73%
1915年	373,834	440,781	85%
1916年	315,994	441,802	72%
1917年	239,050	348,655	69%
1918年	192,822	234,241	82%
1919年	184,269	231,418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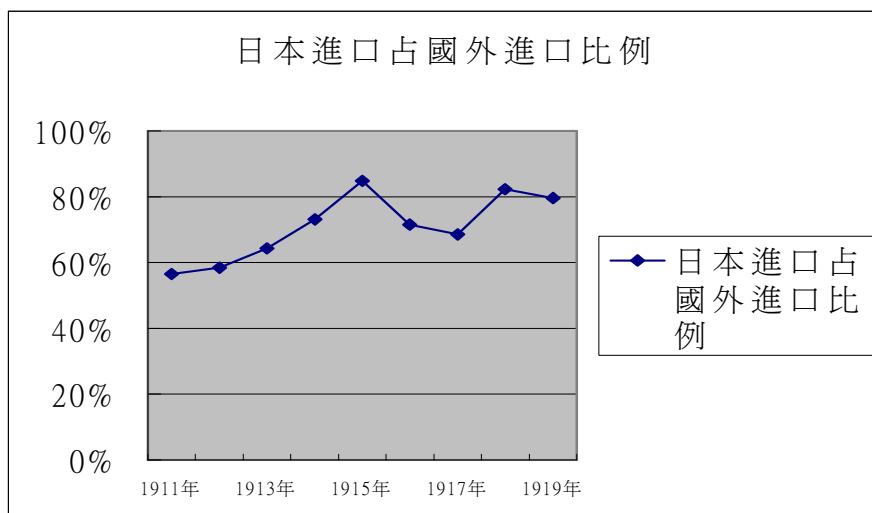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海關年報，1879~1931，天津部份。

<sup>19</sup> 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合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頁247。

<sup>20</sup> 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合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頁255。

<sup>21</sup> 葉淑貞，《天津港的貿易對其腹地經濟之影響（1867~1931）》，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頁173。

圖一 天津日本棉紗進口占國外進口比例圖



由以上圖表可顯示出日本綿紗在總進口棉紗中的比例，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五年左右都呈現上昇狀態，雖然其後到一九一七年有衰退的情況（可能因為歐戰的關係，也象徵此時中國民族工業的確有復興的跡象），但一九一八年又爬昇82%，一九一九年不過下跌了2%，由此可證明，天津地區在五四運動時期，對於日本棉紗進口並無發生大規模的抵制運動。

因此，抵制日貨的目地應在於抵制所有日貨的進口，奪回本土的市場，進一步追求輸出量的增加，但由於國內紡紗技術不佳，愛國布的原料半數以上來自日本製的棉紗；換句話說，愛國布的暢銷也代表了日本紗將源源不絕的流入中國市場。愛國布的成功帶來了國產棉布商的成功，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個成功卻更加猛烈的打擊了中國原本的紡紗業；如此矛盾的成功說明了什麼？是民族主義得勝？還是商人的商戰打贏了？若是民族主義得勝，便不需要犧牲紡紗業來成就織布業；因此，我們必須試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從商業競爭的角度來觀察。

#### 四、天津商人的考量與表現

在討論這個主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商人的身份問題，很簡單的，商人的存在是爲了追求利潤，違背這前提便不能稱爲商人；有了這前提之後，我們才可以進行討論。

五四愛國運動中的與天津商人有關的重要活動便是「抵制日貨、倡導國貨」，基於上段的前提概念，我們必須由他們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避免掉進愛國運動的非理智熱潮之中：



### （一）時局與利益的考量

抵制日貨運動是否合乎商人的利益？就日貨進口及販賣商來說，這當然不合乎他們的利益；此類活動等於是愛國布的強力廣告，不但打響愛國布的知名度，也擴大了愛國布的消費市場，相對的來說日製棉布商就減少了利潤。對經營愛國布的業者來說，這可是他們賺錢的好機會：日貨遭到抵制，除了原本銷路部份為愛國布所奪外，許多日貨遭到查禁及銷毀，日貨的進貨量減少，雙重條件影響之下，愛國布獲得了極大的優勢。就現今商業競爭的角度來看，這種時代背景創造了一種不公平的商業競爭，經營愛國布的業者可利用此一機會大肆打擊對手。但就事實言，這種機會不是長久的，愛國布的市場在一九一九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開始縮減，國外洋布的進口價格開始下降，降低了愛國布的利潤。此外，當時政府的態度傾向與日本妥協，反對抵制日貨之類的挑釁行為，就利益、時局兩方面來考量，支持愛國布的繼續發展將有害於利潤的創造。兩種布類的競爭大部份的因素是利潤的考量，無法確知其是否具有民族意識的對抗心態；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一次大戰結束，加上經營不善的因素，天津紡織業的六大廠（裕元、華新、恒源、裕大、寶成、北洋）<sup>22</sup>中的四廠裕元、華新、裕大、寶成相繼為日商所接管，<sup>23</sup>民族工業搖身一變為日資紡織廠。

因此，要說生產、販售愛國布的業者擁有愛國主義，進而積極參與愛國活動是非常有問題的。

### （二）安家立命的需求

改變陣線是否為了響應愛國運動？這個問題跟隨日貨進口商及販賣商而來，許多經營日製棉布的商人在此時改進愛國布等國產棉布，我們是否能斷言他們是為了響應愛國運動而產生此種改變呢？也許有部份的商家如此，我們不能全然否定，但悲觀的是，恐怕大部份的商家並不作如此打算。商人需要一個安定的社會來進行商業活動，愛國運動發生的同時即是社會動蕩的警訊，商人如何在此種險境中自保，這就牽涉到與現實面妥協的問題；日貨既然遭到抵制，進貨量及出貨量都十分不穩定，這對於利潤的產生已經造成不穩定因素，商人們必須就此點加以改善，以利於利潤的持續及穩定的成長。在這前提之下，他們可能選擇呼應愛國團體的號召，開始經營愛國布等國產棉布，這麼一來既可避免愛國運動對於商家生命財產的威脅，也可避去商業對手的無情打擊，在這股愛國風潮之下繼續維持該商家的穩定經營。就天津來說，天津地區

<sup>22</sup> 其中裕元、華新、恒源及裕大是由軍政界所發起創辦的。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頁57。

<sup>23</sup> 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頁64。

的商人經營愛國布或國產棉布固然得到學生及群眾的支持，但經營日布也未必會受極大影響：據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的〈警察廳轉發交涉公署請各團體勿扣留進口日紗函〉<sup>24</sup>所示：

直隸天津警察廳公函 年 字第194號

徑啟者：案准交涉公署第八十七號內開，徑啟者，案准駐津日本總領事函開，現據本邦商天津棉絲布同業組合稟稱，竊本組合員將與華商訂約之棉紗業運送華界之途，為某團體員時被扣留，實與交貨有礙等情據此，相應函達貴交涉員，請煩查照從速取締，勿使再有扣留等事，並希見復回荷等因。……准此，查前奉省長訓令，以本埠三十八家棉紗各商詣請求一案，飭查核隨時保護等因。當經布告並分行各警區署查照，認真保護，一面函致貴會查照在案。准函前因，除又布告暨加令各警區隨時取締查禁，切實開導，勿任違約扣貨以符約章外，相應函致貴會查照，並希切實開導，毋得扣留，致生交涉為荷。此致天津總商會。

直隸全省警務處長

楊以德

兼天津警察廳長

（津商會三類2996號卷）

政府在天津不贊成“抵制日貨”的立場明顯，保護日貨的態度不變，愛國運動無法造成重大影響。

### （三）天津地區特殊的人脈與資金來源

在愛國運動的風潮之中，部份商人選擇響應國貨的原因之一即是打好未來的人脈關係。只要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地方人脈的問題便始終是一個重點，不論是政界或是商界，人脈的好壞與否往往決定該政治或商業人物的將來命運，因此，身處商界的商人們除了考量自身的利潤以外，也必須偶而爲了打好人脈、鞏固將來而有所犧牲。部份大商家一但決定支持國貨，其餘的小商家爲了將來的進貨問題便會一同響應該活動，此外，愛國運動中不乏有力人士的參與，部份商家爲了結識這些有力人士也同樣的會投入這個活動之中；不管參與愛國活動的行動爲何，基本上這些商家所訴求的部份原因即在結識有力人士並打好關係，以利於該商家將來的營運情況，這段時期或許有損利潤，但換個角度來說，這無非是另一種形態的投資。

換個角度來說，繼續支持日貨的商家又是何種情況呢？他們必須忍受愛國運動及

<sup>24</sup> 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合編，〈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請華商各紗莊速履行契約函並天津商會致各棉紗商函〉，《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二冊，頁2270-2271。

對手商家對其打擊的風險，利潤及生命財產都同時受到威脅，這些代價又換到了何種補償？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打好日後交易的人脈關係。他們選擇了與愛國布業者敵對的人脈關係，就是因為這些商家認為可以藉另一批有力人士，配合外國政界、商界的人物來創造未來的利潤，此次愛國運動正好給予這些商家拉近這類人物的機會，提供了將來商家營運的人為助力；就他們的盤算來看，選擇這些人物比選擇另一邊有利。

就天津的特殊地位來說，天津至少有兩點能夠吸引國內軍政界人士的投資，首先是其近政治中樞北京，以其距離之便吸引許多北京軍政界人士進行投資；此外，天津為條約口岸，地理方面的因素不論人口、交通、腹地三點都是上上之選，此地又是華北自古以來的商業中心，因此成為北京軍政界人士投資的優先考量，天津因此而形成不同於其它口岸的發展過程。<sup>25</sup>

就紡織業來說，一九一九年前後的投資大致情形如下：<sup>26</sup>

表四 一九一九年前後軍政界人士投資紡織廠情形 單位：元

企業名稱	經營形式	設廠日期	資本額	投資者的職務及其投資額
裕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官僚與商人合辦	1915.1 1	560萬	倪嗣沖（總理）110萬 王郅隆（總理）153萬 徐樹錚（董事） 王克敏（董事） 段祺瑞（董事） 馮國璋（董事） 王揖唐 曹汝霖 朱啓鈞 段芝貴
華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官僚與商人合辦	1916.8	1000萬	周學熙（董事） 楊味云（董事） 王克敏（董事） 言敦源（董事） 齊耀琳 孫多森 龔心湛 徐世章 陳光遠 黎元洪 徐世昌 王占元 孟恩遠 王筱汀
恒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官僚與商人合辦	1920.5	300萬	曹銳（總理） 107萬 田中玉（董事） 20萬 鮑貴卿（董事） 54萬 張作霖（董事）54萬 王鹿泉（董事） 9.5萬 齊耀姍（董事） 馮國璋（董事） 陳光遠（董事） 采文軒（董事）
裕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官僚與商人合辦	1920.5	300萬	王克敏（董事、總理） 馮國璋（董事） 張弧（董事） 30萬

<sup>25</sup> 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頁49-52。

<sup>26</sup> 劉怡青，〈商人與軍閥政治（1916-1928）—以天津為例〉，頁59。

公司				李純 8萬 周自齊 曾毓雋 陸宗輿
寶成第三 紡織股份 有限公司	官僚與商 人合辦	1921.6	300萬	陳光遠
北洋第一 商業紡織 股份有限 公司	官僚與商 人合辦	1920.1	200萬	曹錕 7萬 陸錚 1.7萬

由董事份子來看，這六廠的董事多屬有力的軍政界人士，其它商人的投資算少數，他們也難以進入董事會；因此，天津的六大棉紗廠受到軍政界人士的掌控，一方面代表此廠背後的強力後台人物，另一方面則暗示該廠的政治立場偏向於政府的態度。國家的基本政策傾向與日本妥協，這六大廠當然不會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天津商人雖有商會組織，但是不具有同上海商會一般的獨立性，重要的投資者是軍、政界人物，不可能太過違背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態度與訓令嚴重影響商會的決策。

不管是選擇哪一邊來加以支持，筆者認為商家們對於人脈、資金關係的考量似乎大於主動響應愛國運動的熱情。

#### （四）不售日布、日紗未必代表民族意識

首先是華商積欠日商款項的一些事項：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日、二十六日〈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請華商各紗莊速履行契約函並天津商會致各棉紗商函〉<sup>27</sup>記載：

……敝會昨接本邦棉紗布同業公會函內稱，敝國棉紗布商前與貴國各商行批賣貨物即棉紗等品五萬餘包，現因貨價暴落，匯水激騰及它種緣故，現經敝商等估計差損約有五百八十萬兩。前二三年華商各棉紗布莊均得莫大之利益，而至今日稍有損失即不履行前約……<sup>28</sup>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津商會陳述日金風潮中本埠紗業虧損情況及處裡情形函並附紗業各號清單〉<sup>29</sup>記載：

<sup>27</sup> 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合編，〈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請華商各紗莊速履行契約函並天津商會致各棉紗商函〉，《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50-2252。

<sup>28</sup> 天津市檔案館等合編，〈天津日本人商業會議所請華商各紗莊速履行契約函並天津商會致各棉紗商函〉，《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50。

<sup>29</sup> 天津市檔案館等合編，〈津商會陳述日金風潮中本埠紗業虧損情況及處裡情形函並附紗業各號清單〉，《天

……查本埠棉紗業，前因日金激漲，貨價暴跌，一時概受虧損，營業頓形停滯，以致對外對內批貨契約到期皆未履行。綜核此項契約對外應繳貸款，日商方面計銀一千一百餘萬元，西洋各行計銀一千餘萬之譜；對內本業往來統計一千一百餘萬元。內外合計共負債款三千兩百二十餘萬元……<sup>30</sup>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十八日〈直隸交涉員祝惺員請紗商慶豐益號速履行與日本各洋行所訂契約函〉<sup>31</sup>記載：

……現准駐津日總領事函稱，茲據本邦商增田洋行、長瀨洋行、戶田洋行、江商洋行、八木洋行、三井洋行、阿部市洋行、伊藤洋行等稟稱，為天津竹竿巷棉絲布商慶豐益號應交期款延不履行契約，即請轉行中國官憲諭令按照前定期限清還等情……<sup>32</sup>

\*\*\*\*\*

原稟漢譯文

……竊商行等與華商慶豐益交易有年，因上年財界恐慌，該華商不履行契約……是以該第一期業經交款收迄，嗣至第二期即陰曆年底，屢次摧取，竟以行情甚緊為詞迄不履行……<sup>33</sup>

\*\*\*\*\*

具說帖慶豐益洋行鋪

……竊因去歲日金暴漲，貨價跌落，所有早定期貨現貨賠累不堪，幸蒙日商格外讓步……<sup>34</sup>

從以上三則檔案看來，天津一帶部份商人因為日金暴漲、貨價下跌等原因，積欠日商錢款或根本不履行商約，並非因為愛國運動而對日貨有所抵制。

## 五、結語

五四時期的愛國運動的確造成了一股振興民族的浪潮，不論是政界、商界各方面都有人加入這愛國運動的行列，其所形成的影響力也是無可置疑的，像本文所述說有

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64-2266。

<sup>30</sup> 天津市檔案館等合編，〈津商會陳述日金風潮中本埠紗業虧損情況及處理情形函並附紗業各號清單〉，《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64。

<sup>31</sup> 天津市檔案館等合編，〈直隸交涉員祝惺員請紗商慶豐益號速履行與日本各洋行所訂契約函〉，《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67-2268。

<sup>32</sup> 天津市檔案館等合編，〈直隸交涉員祝惺員請紗商慶豐益號速履行與日本各洋行所訂契約函〉，《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67。

<sup>33</sup> 同上註。

<sup>34</sup> 天津市檔案館等合編，〈直隸交涉員祝惺員請紗商慶豐益號速履行與日本各洋行所訂契約函〉，《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12-1928）》，第二冊，頁2268。

關宋則久其人其事，便是商人致力於振興民族工業的最佳典範；然而，無可諱言的是，宋氏等人的努力畢竟沒有取得最後的成功，商人們在面對此一愛國風潮之時，仍然冷靜盤算著利益之所在，換言之，支持國貨與否端看其是否獲利來決定。筆者認為，如宋氏一般為民族大義奉獻之人實屬少數，我們必須認清商人的本質所在，不被民族主義者的熱情所惑，誤將學生愛國團體的熱情同等的投射到商人身上。總而言之，商人們眼中雖未必沒有民族大義，但逐利而行的本質促使著他們審慎思考利益之所在，商業競爭的勝敗成爲了優先考慮的問題。據天津《大公報》第四號，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天津商務總會爲勿故意抬國貨價格再發布告〉所示<sup>35</sup>：

**購買國貨即是愛國、保身之要訣……各工商倘不因勢利導，竭求精良，價格務實，以求推銷；恐此心此志不能經久不敗，甚則因利乘便，巧用時機，故為抬高物價，惹人煩惡……凡操製造貿易國貨各工商，勿故意抬高價格，用短淺之眼光不顧後來厲害……**

36

部份商家以哄抬國貨價格的方式來增加利潤，此舉嚴重的違反民族大義的考量，更可見其利潤導向的經營方式。

以商人的角度來說，與其說民族主義對他們發揮了效用，不如說是因爲利益之所趨使得商家們選擇了參與或不參與抵制日貨、倡導國貨的愛國運動。因此，愛國布的經營與否跟賺不賺錢有關，與民族意識幾乎毫無關聯；民族工業未必具有民族意識，民族工業可以隨時改變爲外資企業，商戰比民族意識更能夠詮釋天津紡織業的發展傾向。

<sup>35</sup> 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合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頁77-78。

<sup>36</sup> 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合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頁78。